

《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

罗渊

(湖南科技大学期刊社, 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 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出版为标志, 中国修辞学研究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文论附庸状态, 建立起独立的现代修辞学学科, 实现了中国修辞学从“文论附庸”到“独立学科”的转型。《修辞学发凡》因为其语言本位观、科学方法论和完整而新颖的理论体系得到学界广泛认同, 担当了完成中国修辞学研究重要转型的历史使命, 引领中国修辞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并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 《修辞学发凡》; 中国修辞学; 转型; 独立学科

中图分类号: H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5-0706-06

20世纪以前, 整个中国修辞学体现为浓重的附庸性, 所有修辞学论说都零散地杂存于文论诗话等非修辞学阐释中^[1], 没有明确的修辞观, 没有典型的修辞学专门著述, 更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门类。到20世纪初, 以《修辞学发凡》为标志, 中国修辞学才真正建立起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修辞学。它建立在语言本位观基础上, 以对象化认知为方法论特点, 把修辞学定性为语言学的下位学科。由此, 中国修辞学研究实现了从“文论附庸”到“独立学科”的转型。

一、中国古代修辞学的附庸性

我国古代没有独立的、专门的修辞学研究。先秦是零珠碎玉般的萌芽状态, 在定国安邦的时代主题中流露出有关修辞学观点; 汉魏以来, 随着书面语、经学、文学等因素的影响, 修辞学认识有所深化, 但那些讨论也是附庸式的, 为经学、文学服务, 《文心雕龙》的存在正好证明修辞学探讨附属于文学研究; 唐宋以降, 中国修辞学思考主要依附于主流文体, 没有出现真正独立的修辞学研究。

我们以郑奠、谭全基《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 1980)为基础, 对中国古代修辞学表现形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依附、杂存特性作简要概括。《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是纯资料性的编选, 也是目前最为专门、较为全面的中国古代修辞学资料汇编。

本书以时间为纲, 史料为目, 虽然取舍方面有所忽略, 但总体上可以概括整个古代修辞学的理论来源(详情可以参见本书的目录和具体内容)。《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的编排次序总体是以时间为线索的, 依次分为“先秦部分”“两汉部分”“魏晋南北朝部分”“唐代论文部分”“唐代论诗部分”“宋代论文部分”“宋代论诗部分”“宋代论词部分”“金元代论文部分”“金元代论诗部分”“金元代论词部分”“金元代论曲部分”“明代论文部分”“明代论诗部分”“明代论词部分”“明代论曲部分”“清代论文部分”“清代论诗部分”“清代论词部分”“清代论曲部分”等。

可以看出: 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修辞学理论大多包含在非修辞学的著述之中。先秦时期的有关论说零碎地闪现在诸子百家的论辩之中; 两汉时期, 虽然修辞学言论有量的增加, 也是为经学服务; 魏晋南北朝阶段, 《文心雕龙》具有浓重修辞学研究色彩, 但是, 总体上是为文学、为文论服务的, 沦为文学的附庸; 从唐代开始, 有关修辞学方面的探讨, 进一步沦为文论附庸, 逐步形成以文体为基础的基本类型, 如“唐代论诗部分”“宋代论文部分”“宋代论诗部分”“宋代论词部分”“清代论词部分”“清代论曲部分”等。根据修辞理论所依附的对象, 我们可以把古代修辞学划分为杂论修辞, 文论修辞, 诗话修辞, 曲论修辞, 小说修辞等。这就足以证明中国古代修辞学研究的附庸特征。

收稿日期: 2009-03-09

作者简介: 罗渊(1963-), 男, 湖南茶陵人, 博士, 湖南科技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语言学, 修辞学。

二、《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转型

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必须具有以下特点:专门性、理论性、专业性。专门性,意味着一门学科要有明确的、专门的研究对象,现代修辞学专门研究语言表达方式与表达效果之间的关系;理论性,要求该学科具有比较完整、系统、深入的理论成果,形成具有较强操作性、科学解释性的理论范式;专业性,表现为在社会分工中有该学科的立足之地,学科研究成为一种专业门类。

20世纪初期,特别是20-30年代,在中国传统修辞研究和国外修辞学的双重影响下,人们似乎看到了一个隐隐约约的“修辞学”的存在,好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一时间纷纷投入“修辞学”研究,出现了大量“修辞学”或与修辞学有密切关系的研究成果,中国现代修辞学呼之欲出。就在这个修辞学探索热潮中,陈望道脱颖而出,他于1932年推出了《修辞学发凡》,把人们头脑中一时还有点模糊不清的“修辞学”“显影”成清晰的、独立的现代修辞学学科,从而宣告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正式建立,完成了中国修辞学研究从“文论附庸”到“独立学科”的转型。《修辞学发凡》明确了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形成了我国修辞学史上第一个完整系统的修辞学理论体系,此后修辞学在中国真正成为广泛深入的专业性研究。

(一) 转型前理论准备

《修辞学发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前辈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在西方学术思想激荡的前提下应运而生。

1. 传统修辞学研究的理论积淀

中国古代修辞学研究虽然是零散的、附庸式的,但是经过两千来年的发展,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理论资源。稍加整理,可以发现三个方面的主要特点:规模化、类型化和范畴化,这“三化”为中国现代修辞学学科的建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准备。

规模化研究是理论系统化的必要前提,没有大量、充分的个别研究就不可能形成体系。中国古代修辞学由先秦零星论析开始,发展到明清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研究局面,首先表现为参与探讨的人员众多,与现在不同的是,在中国古代几乎大多数学者都有过修辞学方面的论述;其次是理论成果不断丰富,围绕修辞学各个方面的理论发现和总结日益增加;第三是研究的深度不断强化,集中表现为《文心雕龙》和《文则》。随着数量的增加,分类就越来越明晰,也便于比较分析,从而使得人们对修辞现象的认识更加深入,这也是理论系统性发展的原理。

宗廷虎在《中国修辞学通史·总论》说过,中国

修辞学研究是随着文体(语体)的演进而发展的。散文修辞论、诗话修辞论、戏曲修辞论、小说修辞论是中国古代修辞学研究的主要类型^[2]。汉代以后,中国修辞学就以书面语为主要研究对象,即使在先秦重视口头修辞时,对书面修辞的探讨也很重视,所以文体学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修辞学的类型化发展。修辞学研究的类型化本质上是一种方法论,把修辞研究与文体形式结合起来,有利于研究的全面性、条理性和系统性,最终促进并保障整个修辞学的系统化。

中国古代修辞学的范畴化表现为由开始时笼统的效果、原则概括发展到修辞原理、修辞手法、文体风格、篇章修辞和修辞接受的系统化论述。这个范畴再抽象一点就是三大部分:一般理论、运用技巧、修辞鉴赏。中国古代修辞学理论经历了一个从笼统归纳到范畴化论析的发展过程。先秦作为修辞学萌芽阶段,受到修辞实践、认识水平、文化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所流露的修辞学理论都是对一般的语言表达效果和语言运用原则的笼统归纳,发现了少量的修辞手法。两汉时期因为书面语的发展,文体意识开始萌发,有文体论出现,对修辞手法的认识有量上的增加。到魏晋南北朝,随着文学的独立和佛教的传布,文体论得到更大发展,并区别了不同的表现风格,同时字句篇章的修辞特色也开始受到重视,辞格论比较突出,还论及修辞理解。至此中国古代修辞学的理论范畴基本上形成。唐、宋、元、明、清等各代的修辞学探索总体是在这个理论范畴之内进行的,所不同的只是认识的深化、方法的更新、视野的拓展和数量的积累,使得修辞学范畴得到更大程度的完善和强化,从而规定着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基本方向^{[3](480-488)}。修辞学研究的范畴化,是修辞学理论走向系统性的一个关键方面。

2. 西方学术思想的激荡

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有自己的特性,观念上以现实效用为出发点,方法上以感悟和经验归纳为主,理论体系上以类型化为主要特征。这些特性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学术或者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负面作用,观念上的实用主义从根本上阻止了思考的深入,一切研究,管用就行,不求深化;方法上的物我一体,遏制了理性思维的发挥,简单的经验归纳不能触及现象的本质;类型化的理论建设不能充分阐明研究对象的内在原理和机制,所以许多理论关键处就显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相对西方学术的长处而言,我们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理论务虚的学术观念和对象化的认知方法。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的一个强大帝国,不断向世界各地输出自己的文明,期间的文化往来,以对外影响为主。但到明清两代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变得国势衰微,异域文明反为强势文化影响着中国的各个方面。

根据葛兆光的总结,明代开始西方传教士带进来许多“西洋奇器”,从物质形式上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人的感官,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理论知识,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潜藏在“奇器”和知识之后的是迥然不同的观念。这一切首先使国人明白“世界”之大,海外有海;“地理世界”的扩大,带来“知识世界”的膨胀,人们进一步了解到异域“万国”也有自己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从而在现实面前逐渐放下“泱泱大国”的自尊,开始接受、重视、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或拿进来,或走出去,结果在中国思想理论和传统学科体系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革^[4]。学术上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被打破,以“经史子集”为框架的学术体系难以容纳不断涌现的新知识,学科门类开始急剧增加,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从此开始。

王力说,“中国语言学曾经受过两次外来的影响:第一次是印度的影响,第二次是西洋的影响。前者是局部的,只影响到音韵学方面;后者是全面的,影响到语言学的各个方面。”^{[5](173)}中国修辞学的变革就是“西学东渐”背景下学术思想变革的结果,是中国语言学发生观念性改变的结果。

(二)《修辞学发凡》的理论品质与转型的必然性

《修辞学发凡》作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代表,其理论品质具有崭新的现代学科特征,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论品质,使得中国修辞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所以说,《修辞学发凡》的理论品质规定了中国修辞学研究必然由传统的附庸状态走向学科独立。我们结合修辞学的实际,主要从“修辞观”“方法论”和“理论体系”三个方面来阐述《修辞学发凡》的理论品质,即现代学科特性。

1. 语言本位观

确立以语言为本位的修辞观是中国修辞学得以成为独立学科的一个关键因素。语言本位观保证了现代修辞学的学科“专门性”,学科的对象与任务得以确定。中国修辞学在古代没有建设成真正学科意义上的“修辞学”,主要因为与文论诗话混同一起,边界不清,对象不明确。到20世纪初又与文法、文章学等混为一谈,还是不能给人明确、清晰的学科影像。陈望道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敏锐地洞察到修辞学的语言学本质,从而廓清了修辞学的学科界限,使中国现代修辞学得以建立并取得长足的发展。

作者在初版后记里点明了《修辞学发凡》的目的之一就是“画清”修辞学的“经界”。他在后记的第四条说:“本书几篇新稿系根据多年来研究文艺理论,社会意识,以及其它一切关联学科所得,想将修辞学的经界略略画清,又将若干不合实际的古来定见带便指破。”^{[6](257)}那么陈望道所说的“经界”是什么?就是以语言为本位的修辞观。《修辞学发凡》开篇就提出了

“修辞”“习惯用法的探讨”,认为“修辞”应该确定为“调整或适用”“语辞”,而不是“文辞”。“语辞”包括了口头和书面的,“文辞”仅仅限于书面,不免偏颇。这说明作者倡行的是全面的以语言为本位的修辞观,既然修辞学是语言学的,必然包含口语和书面语。书中又说:“像这样的修辞学,我们可以说是一种语言文字的可能性的过去试验成绩的一个总报告。最大的功用在使用人对于语言文字有灵活正确的了解。”^{[6](251)}这里直接点明修辞学是“语言文字”的,作者还指出“修辞是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从旁证材料看,陈望道坚持的是语言本位的修辞学观念。《修辞学发凡》的整个内容安排都是围绕语言文字展开的,甚至连后来被认为是修辞学当然内容的“篇章结构”也没有包括进去,可见其纯语言学性质。

语言本位观奠定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的专门性基础。

2. 科学的方法论

《修辞学发凡》作为中国现代修辞学建立的标志,除了得益于它的语言本位的修辞观之外,还有赖于作者科学的方法论。一门学科的建立要有正确的学科观念,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这三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修辞学发凡》的方法总体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南,具体说来,就是对对象化认知、对立统一、动态考察、发展观、中西结合等等。

对象化认知方法把人从中国传统的物我一体式认识模式中独立出来,一方面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保证了一切认识都置于人的主观统摄之下。现代汉语修辞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把修辞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不再与文学批评、文章学研究、语法学等交集在一起。另一方面使认识对象更加明确、清楚,便于研究中进行观察、分析、比较、概括、描写等,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得以更加深入。对立统一的辩证方法是贯穿整个《修辞学发凡》的统摄性方法。口语与书面语、形式与内容、消极与积极、基本原则与具体手法、简约与繁丰、刚健与柔婉等等,每一个方面的论述都渗透着辩证的思想。^[1]陈望道还采用动态考察的方法研究修辞过程。他从宏观上把修辞活动纳入交际过程,强调“写说者和写说物和听读者各都成为交流现象上必不可缺的要素”。这是从交流的动态过程给修辞定位;然后又把修辞活动分为三个阶段,收集材料、剪裁配置、写说发表。这是从修辞本身的动态特性来分析修辞现象。《修辞学发凡》专门谈了“汉语文变迁发展的大势”,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语言的发展,从而指导修辞实践和修辞学研究。作者说:“我们讲究修辞,需要通晓汉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尤其需要通晓这种汉语言文字变迁发展的大势,正确地灵活地加以阐发和利

用。”^{[6](272)}中西结合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观念,《修辞学发凡》就是中西结合的产物。首先作者自己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他对欧美和日本的修辞学理论以及语言学理论有相当的钻研,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有深刻的研究,所以他的学术背景就是中西合璧的,方法上兼采中西之长;其次,在具体对待每一个研究对象时,也“无论中的外的古的今的”都可以“参考”或“作为我们解决方式的佐证”。陈望道一贯主张“一手向外国拿东西,一手向古代拿东西”,这已成为后学者遵从的学术圭臬。

科学方法的运用是保证研究可靠性、科学性的必要前提,也是促成理论系统性的关键因素。

3.完整而新颖的理论体系

《修辞学发凡》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修辞学理论体系,体现出系统的观念。作者首先澄清“修辞”概念,提出“语辞”说;然后从语言本位出发作“说语辞的梗概”,阐述语言与修辞的关系;再就形式与内容作两大分野的论述,指出形式与内容是一种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接着用消极和积极来统率各种修辞手法,消极修辞就是古代“质”的原始范畴,积极修辞相当于古代“文”的实质内容,这里也体现为“文质兼备”的思想;随后附带阐述了修辞的“通变”,“变化和统一”,用辩证的思想指导修辞和修辞学;最后分析不同文体的语言风格,从正反对立的两面入手,分析了四组八种基本风格。这样的—个修辞学理论体系,从宏观方面看,完整而严谨。从修辞观、修辞原则、修辞学对象任务,再到修辞方法等,都有精当的论述。从微观方面看,每一个内容都运用辩证的原则作了进一步分化,比如“积极修辞”又分“材料上的”“意境上的”“词语上的”“章句上的”等,每个方面还分若干小类。这样的理论系统体现出高度的层次性和系统性,前无古人,后启万端。

作为中国修辞学现代史上的开山之作,《修辞学发凡》属于“古今中外派”,它“继承吸收古今中外的修辞理论,固然在我国修辞学界不算早,但却以融会贯通见长,更重要的是他能不囿于前人陈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修辞学发凡》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修辞学的光辉代表和壮丽的丰碑,是我国修辞学群山中第一座矗立云霄的高峰,成为我国20世纪修辞学界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7](118-119)}以后近20年中国的修辞学研究基本上是在《发凡》体系基础上进行,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有一定深化,涉及面有所拓宽,从总体上来说,所取得的成效不能超过《发凡》。直到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修辞学才在《修辞学发凡》奠定的基础上、在广泛的普及提高中得到新的发展。

《修辞学发凡》只是作为中国现代修辞学建立的

标志或代表,并不意味着它集中了所有的现代学科成就,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是整个时代思想发展的共同结晶。于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而言,仅仅《修辞学发凡》是不够的,《发凡》在那个历史时期起到了标志作用,发挥了示范效应,力行了推广普及的基础性工作。

三、《修辞学发凡》与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繁荣

从转型的角度来说,《修辞学发凡》完成了中国修辞学从古代“文论附庸”型到现代独立学科型的转化,这种转型的本质在于观念的改变、方法的创新和随之而来的新型理论框架。对于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繁荣发展,这次转型具有以下三方面的作用:

(一)观念统摄作用

观念反映着人对客观现象本质的认识,它是决定人们行为动因、行为目标、行为方式以及行为结果的先决条件,也在宏观上决定了学术的发展方向。以《修辞学发凡》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修辞学树立了以语言为本位的观念,根本不同于古代以实用为本的修辞观,所以现代修辞学摆脱了附庸地位,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从修辞学内部发展来说,语言本位观启发了人们的思维,把修辞看作语言现象,就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方向上来,不像古代那样,没有明确观念,虽然明显感到有修辞的存在,但就是说不透它的本质是什么,只好一切围着效用转,永远沦为附庸。一旦语言本位观把修辞学研究统一在语言范围内,就可以在这个前提下对修辞和修辞学下定义,认清修辞的本质,从而明确了修辞学研究的总目标,目标确定了,方向也就掌握住了。事实上,《发凡》以后的近百年里,中国修辞学都在围绕语言进行。明确了修辞学的研究目标,就可以进一步确定修辞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等等,现代修辞学把“文辞”和“言辞”都定为修辞学研究对象,把范围基本规定在“表达”之中,从而结束了把修辞与文法、文章、文学理论等混为一谈的历史,保证了现代修辞学的独立发展。对象、范围清楚了,任务也就明了,现代修辞学认为,修辞学既要研究实践中的修辞现象,也要研究修辞理论,对前后左右的研究成果展开再研究。

从修辞学研究的外部情况来看,《发凡》以后,语言本位的修辞观—直统领着中国的修辞学研究,各个阶段的代表性成果都是语言本位的修辞学探索。20世纪30~40年代,无论“新派”还是“旧派”,共同点都是“语言派”,“新派”如徐梗生《修辞学教程》、“旧派”如薛祥绥《修辞学》等,另外还有郭绍虞《修辞

学通论》、郑业建《修辞学提要》等,都是在语言范围内展开修辞学探索。当时还出现了修辞学专题研究,如施畸《中国文体论》、黎锦熙《修辞学比形篇》、宫廷璋《修辞学举例·风格篇》、将伯潜,将祖怡《文体论纂要》等,也都在语言统摄之下。50~60年代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张瓌一《修辞概要》、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倪宝元《漫谈修辞新例》等都是语言本位的修辞学研究成果。80年代以后的修辞学研究虽然出现了多样性发展趋势,但传统的语言本位修辞论占主导地位,诸如王希杰的修辞学研究“通论”“新论”“导论”等,还有宗廷虎《修辞新论》、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刘焕辉《修辞学纲要》以及林文金《辞格》、袁晖《比喻》、李嘉耀《选词》等等。

(二) 方法保障作用

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比如分析、归纳、演绎、综合、比较、描写等等,这些方法或者自古就有,或者是修辞学现代化的产物,都是具体的操作性方法。从转型的角度来看,从哲学层面上来说,《修辞学发凡》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根本性方法就是对象化认知。这种方法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从认识对象中独立出来,强化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使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和认识主体的主导性得到充分的体现,从而最大限度排除因为“物我一体”所带来的认识的模糊性。从主观方面看,这样可以尽可能地避免人的主体意识的削弱甚至丧失,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保证整个认识过程都在人的主导意识的掌控之下。人就可以根据不同的意图、需要、目的、条件等因素来调控自己的研究行为,减少或者避免研究的盲目性、被动性和从属性,从而确保了现代修辞学不至于继续沦为其它学科的附庸,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学科独立性提供了方法论保障。对比一下中国古代修辞学的思想方法就更凸现出这种对象化认知的方法对于保障现代修辞学独立性的重大意义。中国古代的修辞学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一直没能自觉、明确地运用对象化认知的方法。在我们祖先的传统观念中,世界是一个“天圆地方”的整体,这种封闭式的物化观念束缚甚至扼杀了人的发散性思维,使得我们民族养成了一种“内倾”的文化心态,这几乎就在我们民族“先天性”的文化心理上形成一种对创造性思维的制约机制。另一种天下大同观念,主张“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在认识中强调“大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不分,从而消解了“边界”,泯灭了差异,表现在学术上常常是文、史、哲等多学科的混合一体,这种方法类型造成研究上分工不够细化,力量分散,影响了研究的深入。以儒家思想为大一统的实用主义价值观成为中国古代一切学术探索的“终点站”,几乎所有的实践活动都停留

在“足用”的“驿站”,不再继续前进。因为只注重实效,所以不求甚解,缺乏深入细致的探究意识,着重宏观上的把握,以整体“感悟”“体悟”为基本方法,在“物我一体”化中实现认识的“整体渡让”,这样的认知特性严重阻碍了科学理性的滋长。

《修辞学发凡》总体上运用了对象化认知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保持修辞学的独立学科性,乃至对于整个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发展繁荣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此后中国修辞学研究一直秉承、光大了这种方法,它保证了中国修辞学的不断深入,并更加专门化、专业化。把表达现象对象化了,就可以进一步深入探究表达的本质、原理、原则,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王希杰《修辞学通论》等就是这种深入探究的代表。专门化探索,能够把有关修辞的各方面、各个具体的现象认识更透彻,比如各种各样的辞格论、语体论、风格论、遣词造句论、修辞病例分析等。

(三) 理论奠基作用

《修辞学发凡》作为中西结合的理论体系,同时奠定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理论框架,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修辞学的研究大体是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进行的。《发凡》在两个方面为中国现代修辞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个是思想观念的基础,比如语言本位观、语辞文辞观、题旨情境说、积极消极论等;另一个是理论范畴的基础,比如原则论、辞格论、篇章布局论、文体论、风格论等。

就思想观念方面的影响来说,那是一种潜在的前提性影响。从此以后,中国修辞学研究都集中在语言的范围内,体现语言本位观,无论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还是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王希杰《汉语修辞学》《修辞学新论》等一批有代表性的著作都是以语言为本位的;消极与积极的分野在各种修辞学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得到体现,虽然从量的方面看,积极修辞研究多于消极修辞,但在观念上两方面都得到重视,其中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等主要偏重于消极修辞,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等偏向积极修辞;人们还把口头与书面两种语体都纳入修辞学研究视野,表现出对文辞和语辞的同等对待,尽管实践中文辞一般多于语辞,从理性思维看,两者都有所顾及;论述修辞的主要评价尺度就是把表达与具体情境结合起来,这也遵从了《发凡》的“题旨情境说”。

从基本的理论范畴来看,《修辞学发凡》的理论范畴分两个方面:首先是修辞学的一般原理,包括“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这个范畴其实就是前面说的思想观念方面的内容,这里从略;其次是修辞手法,包括“第四篇”到“第十一篇”的8篇,这里包括了积极与消极的分野,在此统摄下分别为辞格论(第五、六、七、八、九篇)、篇章布局论(第十篇)、文体风

格论(第十一篇)等。从《发凡》的这个体系可以看出,它是一个以表达手法或者修辞技巧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全书12篇,有7篇是直接论述修辞手法的,这7篇里直接论述修辞手法典型的辞格论占5篇,所以说,这个理论框架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修辞学“技巧论”的鼻祖,从此以后中国修辞学基本上就走上一条以修辞技巧为中心的发展道路。

从修辞学教学体系看,国内比较通用的代表性《现代汉语》教材(无论黄伯荣、廖序东主编还是胡裕树主编或者张静主编的)里的修辞部分基本上是按三大块讲述的,一是通论部分,阐述有关修辞学的定义、任务、对象、原则等内容;二部分是语言与修辞的关系,分别从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说明它们与修辞的联系;三部分就是修辞格。其中的第二部分也是一个“技巧”问题,说明修辞学教学的理论体系是“辞格中心论”或“技巧论”体系。另有高校中文专业专门的修辞学教材,比如宋振华等主编《现代汉语修辞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十章中有八章谈修辞技巧。倪宝元主编《大学修辞》(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十章里八章属于技巧论。其它教材大同小异,总体属于技巧论范畴。

从修辞学专门研究方面看,《修辞学发凡》以后的修辞学著作总体上继承了《发凡》的理论衣钵,大多是以修辞技巧为中心的。比如1933年徐梗生《修辞学教程》“是现代修辞学史上,对《发凡》的体系继承得最多得专著之一”^{[3](425)}。杨树达《中国修辞学》总共十八章,从第三章“修辞举例”到最后一章“省略”都是修辞技巧问题。更有马叙伦《修辞九论》直接从九个方面,讨论修辞艺术,纯粹的技巧论。建国以后,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的“表达”部分专

注消极修辞,本质上属于表达技巧范畴,无论“逻辑”“费解”“歧义”“重复”还是“堆砌”“繁冗”“苟简”“层次”等,都是一个语言运用原则和技巧问题。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发展了《修辞学发凡》的理论,但还是在“技巧论”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全书分十章,一、二章属于通论性的,后面八章就是有关修辞技巧方面的论述,它们是“现代汉语语言各因素和现代汉语修辞手段”“现代汉语修辞方式总说”“现代汉语修辞方式分说”“现代汉语各类辞式的交错运用”“现代汉语寻常词语的艺术化”“现代汉语修辞和语体”等内容。1983年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出版,也有所创新,但从主体内容看,依然是“技巧论”传统的延续。全书十二章,第三章以后就是谈修辞技巧的,最后一章“结语”从辩证法方面深化了修辞学原理。10年后作者推出了《修辞学新论》,全书四卷,二、三卷“辞格论”和“词句学”属于“技巧论”的内容。

参考文献:

- [1] 宗廷虎. 20世纪中国修辞学[M].
- [2] 郑子瑜, 宗廷虎. 中国修辞学通史·总序[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8.
- [3] 易蒲, 李金苓. 汉语修辞学史纲[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9.
- [4]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 [5] 王力. 中国语言学史[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 [6] 陈望道. 陈望道文集(第二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 [7] 袁晖. 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M]. 北京: 书海出版社, 2000.

An Introduction to Rhetoric and Transformation of Rhetorical Studies in China

LUO Yuan

(Editorial Office,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Marked by Chen Wangdao's *An Introduction to Rhetoric*, the rhetorical studies in China ended the long-term dependency of literary theories, built up independently modern rhetoric discipline and transformed itself from “dependency of literary theories” to “independent discipline”. Widely recogniz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for its language ontology, scientific methodology, complete and original theoretical system, *An Introduction to Rhetoric* has shouldered the historical task of transformation of rhetorical studies in China, led Chinese rhetorical studies into a newly historical stage and laid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prosperity of Chinese modern rhetoric.

Key words: *An Introduction to Rhetoric*; rhetoric in China; transformatio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编辑: 汪晓]